

## 關於滿洲國之建構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By Prasenjit Duara.

Lanham;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xi+305pp.

### 評文一

陳永發\*

滿洲國是日本在東北建立的傀儡政權，愛新覺羅溥儀是日本人的兒皇帝。只要一提到滿洲國，我們的思維就停頓在這兩句話上面。杜贊奇討論滿洲國的新書，承認滿洲國政府中的日本官員是以日本為其主要效忠對象，然而堅持這只是考慮問題的一個角度而已，此外還有三個重要角度。從政權形式來看，滿洲國是軍事法西斯政權，然而畢竟不同於納粹，它揭棄種族協和，並無純化日耳曼民族的類似觀念。其次，從國家形式來看，滿洲國既異於前現代的國家，也異於傳統殖民地，乃是不折不扣的現代國家，以融合東西方文明為職志，具有作者所說的動態東亞現代性(East Asian modern)。再其次，滿洲國確立其國家主權時，正因為有前述緣故，故具有三大特色：亦即多元文化主義，救贖性的普世主義，和融合中西文明精華、實現王道樂土烏托邦的思想。

作者所謂多元文化主義，即承認各民族的文化有其道德、倫理和精神價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值，因此平等對待，而各民族應彼此尊重，和諧相處；所謂救贖性的普世主義，即協助具有救世和大同思想的宗教組織進行活動和發展；而所謂融合中西文明精華、實現王道樂土的理想，則是一方面追求西方利用厚生的科學和物質文明，另一方面則揭櫫東方文明中的精神價值，以便建立一個二十世紀的模範國家。杜贊奇特別強調，滿洲國的國家主權是建立在「文化的本真價值」(cultural authenticity)之上，由於國家和文化的地理範圍並不一致，所以這兩個「認同」因素之間，經常出現彼此拉扯的緊張關係。

杜贊奇這一本書的重點是，探討滿洲國如何以其宣稱的文化本真價值，為其國家主權提出不辯自明的理由。可能因為這樣一個研究設計，他必須正視滿洲國的國家主權主張，並進而強調「滿洲國」發展為真正獨立國家的可能。在他看來，滿洲國這塊土地本來便是幾個民族爭奪和匯合的地區，並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姑且不論此一論點能否成立，杜贊奇以此為出發點，探討滿洲獨立建國以後，如何從「東方文明」的角度來追求本真價值，以便證成其獨立主權的主張。杜贊奇指出，滿洲國肇建之初，除了學習西方現代文明以外，特別揭櫫王道主義和教化主張，高倡日、滿、漢、蒙、朝鮮諸民族一家，以德服人，不以力服人。滿洲國還不同於中日兩國，對具有救贖性普世價值觀的民間宗教組織，譬如道德會和世界紅卍字會，採取團結、利用和改良的態度，透過這些宗教組織鼓吹和維護傳統自我犧牲價值，以便維護父權政治秩序；同時也透過它們宣傳國策，動員人力和物力，以便伸張國家權力。滿洲國還從中日兩國攸關東北地理空間的文學藝術和學術著作中，發掘作者所說文化的本真價值，據以培養和激勵對滿洲國這一塊土地的認同和感情，為滿洲的獨立建國服務。

杜贊奇的真正興趣，與其說是在研究滿洲國本身的歷史發展，不如說是探討滿洲國爭取國家主權策略背後的思想背景。早在第一次歐戰宣告結束前後，歐美思想界裡，懷疑西方文明的論調蔚然成風，甚至指責其為戰禍根源，傳統帝國主義更普遍遭致唾棄；歐美國家的各殖民地，出現風起雲湧的民族

主義運動，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潮應時而興。不僅歐美國家的知識分子，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潮流不可抗拒的說法抱持懷疑，東亞地區中國和日本的知識分子，也都積極肯定東方文明的本真價值，回歸被認為是精髓的傳統文化、道德和倫理，形成作者所謂動態的東亞現代性論述。滿洲國在這個思潮中建立，其締造者也在版圖內尋找文化的本真價值，以便國家主權之說不辯自明。

作者強調，這一新時代的論述，並不排斥所有西方文明，反而承認其中大有必須學習的成分；具體的證明是，當時流行於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和發生於中國的東西方文化論戰以及新生活運動。滿洲國的王道樂土觀念，即源自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主要是以東方文明為本位，利用西方的科學和行政技術來加以實現。同一時期，中國和日本的民間宗教組織，以傳播東方文明的使命自任，一方面想要匡補西方物質文明的缺失；另一方面則想要吸收西方的科學和宗教文明，興學辦報之外，更採取新型的社會教育方式（譬如圖書館）和經濟制度（互助借貸），幫助傳播教義，並進行國際慈善和交流活動。同時，日本和中國相繼出現宗教團體，一方面強調宗教價值和維護傳統婦女道德；一方面也提倡婦女現代教育，給予婦女參加公共活動的空間。此外，無論日本和中國，都有知識分子透過社會科學研究和文藝作品的書寫，肯定地方或區域文化的價值，有意無意之間則為其各自的國族主義服務。日本人自認為是東北亞通古斯族支裔中學習西方文明的楷模，鄂倫春族則仍然停留在原始的漁獵社會階段，保存通古斯族文化中對原始森林的崇拜，於是通過到鄂倫春族尋根，確立日本人在東北的領導地位。中國人則強調鄂倫春和華北文化的共同點，尤其強調關內外的農民文化一體，把白山黑水已經「土著化」的漢人農業聚落「內地化」，以便激起懷念和熱愛之情。滿洲國則從中日兩國受其各自國族主義影響的社會科學研究和鄉土文學作品中，擇取有利於滿洲建國的部份，加以大力鼓吹和運用。

這種注意力完全集中於滿洲國獨立建國文宣策略的研究方法，固然矯正過去完全從現代中國國族主義觀點來定位滿洲國的作法。但過猶不及，似乎

也叫人有浮身雲端的感覺。首先，國家主權和文化本真性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是否文化的本真價值被據以建構認同後，便會自動產生國家主權？同樣重要的問題是：文化的本真價值究竟指的是什麼？難道只是用幾個古籍字眼包裝的立國原則而已？需不需要通過實踐的檢驗？如果這些本真價值需要認可，誰的認可纔能算數？其次，把視野從理論轉移到滿洲國上，也應該追問：滿洲國宣稱他們擁有文化的本真價值，便表示滿洲國能夠真正獨立，而其國家主權也從此固若金湯嗎？尤為根本的問題是：討論滿洲國的國家主權，只需要注意參與滿洲國建國大業之日本人的言論嗎？難道不該同時注意一下漢、滿、蒙、朝鮮等其他民族代表的想法嗎？這些滿洲國的非日本籍居民到底如何思考忽然加諸其身的「滿洲國國民」身分？是否願意為這一個全新的國家認同而奮鬥犧牲？

可是，杜贊奇這一本書，從頭到尾只看到滿洲國內日本籍官員的主張，至於東北其他在地人民的內心想法，則全然不聞不問。讀者既不知道這些民族中的大多數人，到底是為什麼接受滿洲國統治的事實，也不知道他們是否已經明顯形成「滿洲國國族主義」的認同，更不知道他們對日本人所認為的本真價值採取什麼看法。在日本貴族近衛文麿、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等人用中國古典字彙表達滿洲國的建國理念時，到底有多少其他民族的菁英會心有同感？滿洲國成立前夕，曾經有相當多的漢族地方菁英倡導保境安民，成立維持會，但這是否表示他們全力擁護滿洲獨立建國，或接受日本人的亞細亞主義？漢人大量參加民間宗教的組織，也確實起了鞏固滿洲國統治的作用，但有什麼證據顯示，他們會因為滿洲國揭櫫東方文明的本真價值，就同意滿洲獨立建國的主張？其實，就是對成立滿洲國極有興趣的滿蒙上層人士，也沒有什麼證據顯示他們具有獨特的滿洲國國族主義認同。杜贊奇再三強調協和會揭櫫五族（漢、滿、蒙、朝鮮和日本人）協和，但不曾就協和會的實際運作仔細分析和討論，尤其並沒有針對日本人以外其他四個民族的反應進行討論。難怪閱讀本書總有置身雲霧的不實感覺。

再說，滿洲國以現代化的工業建設，來爭取民心，固然是不爭之論；但是杜贊奇的證據也顯示，日本建設滿洲國是爲了厚積日本帝國的「國」力，以便有朝一日和美蘇兩個白人國家展開決戰。滿洲國這方面表露出來的所謂現代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環，決不能將其孤立出來特別強調。當然日本人開發東北，把東北建設成爲比關內進步的地方，有發達的鐵路運輸網和現代港埠設備，有成體系的國防工業和重工業，也有外表看來不遜於歐美日本的現代化大城市，更有具有現代化效率的行政機構，以及相當健全的國家資訊蒐集制度。但是這些成就能令人忘記日本在東北表現出來的帝國主義行徑嗎？作者雖然在這一本書中再三提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面，但是在討論日本帝國主義所帶來的進步面時，仍然令人感覺，他把國家主權的問題簡化成對本真價值的追求，以致到處流露出對日本人建立滿洲這一個傀儡國家的同情。

杜贊奇對融合中西文明的想法似乎心有戚戚焉。他很清楚當時日本和中國兩國人士在揭櫫東方文明的大旗時，其實並沒有講明白所謂東方究竟是指國家還是區域，所以國族主義者可以用來辯護同化境內少數民族的主張，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者也可以用來作爲侵略他國的藉口。杜贊奇對國族主義和文化認同之間的複雜關係有相當精彩的討論。但是具體討論到當時流行在中日兩國的王道觀念時，卻似乎不了解所謂王道乃針對霸道之說而來，因此認爲，教化一旦不行，便可濟之以武力，王道有窮則濟之以霸道。從這一個觀點來解讀中國古典書籍，難怪作者會說，漢代主張王道的儒家大臣，發現王道無效以後，決定以武力對付匈奴。殊不知事實相反，當時儒家大臣十分反對用兵匈奴，尤其反對完完全全的霸道。孫中山談論王道思想時，就採取這個角度。如果他提到朝貢制度，也是因爲朝貢制度的理論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根據這一個邏輯，日本如果真正發揮王道精神，則未來的中國一定唯東鄰日本的馬首是瞻。孫中山怎麼會無事生非，刻意以朝貢制度提醒日本聽眾，他的野心是恢復中國昔日爲天下共主的榮光呢？當時沒有什麼日

本人聽得進孫中山的勸諫，反而打著王道的旗號，對中國肆行侵略，因此對有政治意識的中國人而言，日本人高唱的亞細亞主義，不過是帝國主義的遮羞布罷了，並不具備什麼可以「懷柔遠人」的道德說服力量。

杜贊奇很清楚，滿洲國的民間宗教組織源於中國傳統，但是強調它們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轉變，認為也是所謂亞洲現代性的表現。不過當他用救贖性的普世主義來形容這些民間宗教組織時，令人懷疑他是否過分強調了它們的宗教性，及其改變世道人心的超國界宗旨。他對照滿洲國和國民政府兩者對民間宗教組織的政策，指出一則維護和改造，一則取締和鎮壓，結果前者爭取不少民心，後者則引起離心離德。杜贊奇這一個說法相當有趣，且具說服力。但是因為對這些民間宗教組織的討論並不十分深入，尤其暗示它們可能是文明更新的憑藉，所以還是令人懷疑，是否低估了它們的傳統性，從而誇大其現代性。這些民間宗教組織，確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蓬勃發展，有宗教救世之心，並以實現大同理想為念，但似乎尚無充分的理由以救贖性的普世主義者予以形容，因為基督教的救贖觀念和普世主義迥然有異。這些民間宗教強調修養、強調清心寡欲、強調棄絕物質享受，卻無一神教的原罪觀念，認為行善是積德而非救贖，也不把人生的苦難看成信仰的考驗，而全心全力追求與超自然神祇（上帝）作心靈溝通的經驗，反而相信扶乩，請玉帝、請老子、請關帝、請佛祖，甚至請耶穌、請穆罕默德，求神問卜，充滿世俗的功利主義。

作者關於日本人利用民間宗教組織，尤其是道德會的討論，非常精彩。他提出「現代性中的傳統」這一個觀念。認為無論中國和日本都以男女隔離的方式動員婦女，他們為婦女創造活動的空間，但同時也為婦女的活動設下限制。他們理想的新式婦女，雖然應該受過某種程度的現代教育，卻也應該發揮犧牲精神，成為家庭和社會更好的成員，因此選擇無私奉獻自己給男人的女性，為其會眾崇拜和學習的對象，而置婦女的主體性於不顧。這種說法，有其道理。作者進一步又指出，滿洲國的宗教和婦女政策有助於其統治，從

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指責滿洲國境內宗教和婦女組織是漢奸團體，並不能令人心悅誠服。這個見解，也令人產生共鳴；但是作者有什麼理由再三強調，這些宗教及其成立婦女組織具有現代性和普世性呢？道德會標舉三從四德和守貞守節，容忍多妻制，老婆爲了家庭和諧必須幫忙丈夫娶小老婆，因此道德會的現代性不能過於高估。道德會這種民間宗教組織，承認政治現實，樂意依附和利用政治，他們也聽得進王道樂土和民族融合這些政治主張；但是這能表示他們認同滿洲國的獨立建國的主張嗎？他們願意爲滿洲國的主權立場奮鬥不懈嗎？滿洲國對民間宗教組織採取開放和支持的態度，當然有利於其統治，也可以爲其獨立主權的主張增加辯護理由；但是能因此下結論說，滿洲國因爲這一政策而其獨立主權的主張必然受到「國」內外的承認嗎？

杜贊奇非常同情民族協和的多元文化主義。有的時候讓人感覺，是否已經影響其對資料和文本的解讀了。日本人試圖利用梁山丁的《綠色的谷》，傳達其反城市化、反商品化、反資本主義化的思想，並利用其作品中的鄉土感情與認同（農村、森林和紅鬍子），培養對滿洲國的認同；但是從其作品中他們也總是發現作者政治立場上的曖昧，尤其對「滿洲國國族主義」並無明顯的立場。所以梁山丁的這一個作品，可以像東北作家蕭紅和蕭軍的小說一樣，增加對東北的認同和懷念，而有助於中國國族主義的搗成。另一方面，作者過分誇大日本人的多元民族主義的主張。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對全滿婦女團體聯合會寫了一封信，要求婦女致力於日滿融合。他一面提倡跨族婚姻，一面又要求區隔各民族，維護日本民族高高在上的地位。其策略的兩手性質(duplicity)，既然彰然可見，不曉得杜贊奇爲何還要強調日本人日滿融合的高調，而不注意口號和實踐之間的巨大差距，將阻撓滿洲國成爲一個真正民族協和的國家。孫中山和蔣中正兩人都曾相信和提倡過大亞細亞主義，然而日本人的實際行爲卻傷透了他們的心，所以孫中山晚年要聯俄容共，蔣中正也以日本爲大敵，在抗戰爆發前後聯蘇，珍珠港事變之後聯美制日。如果這本書的讀者是日本人，我希望他們不要耽溺在日本人的理想主義上面，而

要痛自反省爲什麼中國人無法對之認同；不要僅僅懷念建立王道樂土、多元民族的國家，以及融合東西兩大文明的口號而已，也要注意言行合一。

杜贊奇總認爲二十世紀的國族主義爲虎作倀，經常成爲對外侵略或對內壓迫的藉口，所以一向致力於解構國族主義，力圖解救被各國國族主義壓制的歷史。當他發現滿洲國的建國理想是建立在多元文化的相互尊重原則上時，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這一本書可以說是，中日兩國國族主義扼殺滿洲建國理想的歷史。這兩個國家都根據自己的想像界定其國族主義的內容，中國強調清朝的領土範圍，所以大力向邊疆地帶伸張國權，爲少數民族帶來災難。日本也向外擴展，追求其生存空間，只是改變侵略方式，由強調直接統治轉換爲強調間接統治而已。雙方都不容許滿洲獨立建國，給予滿洲國充分發展的機會，滿洲國因此淪爲俎上魚肉。對於此一發展，杜贊奇深感遺憾，甚至由同情而偏執，竟然暫時忘記東北之所以能成爲「獨立」國家，本來就是依賴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而迥非大亞細亞主義所揭櫫王道精神的充分發揮所致。爲了讓滿洲國有成爲王道樂土主權國家的可能，杜贊奇一味強調中國民族主義者所不願面對的一些歷史事實，有時令人覺得他替滿洲國「去中國化」去得有點過頭。相形之下，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滿洲國成立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他就顯得輕描淡寫多了。其實，熱心於滿洲獨立建國的日本仁人志士，即便充滿理想主義的誠摯，並因爲揭櫫東亞現代性，而取得了當地其他各民族的民意支持，他們也因爲從不考慮「去日本化」，切斷其聯結日本母體的各種臍帶，而很容易被形勢逼往背離初衷，轉而成爲日本帝國主義幫兇。作者脫離現實政治的脈絡，單單討論滿洲國主權和文化的關係，終究令人憂心：會不會因此已經在無意之中把歷史研究轉變成單純的概念遊戲？儘管有此懷疑，卻必須在此指出：杜贊奇的治學氣象浩大，不僅融歷史學、人類學和文學批評於一爐，更就二十世紀東亞地區國家主權、文化認同和帝國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現代知識生產和鄉土文學創作如何與國族主義政治互動，作出令人擊掌的深刻分析，值得仔細閱讀。